

刘坚文存

上海教育出版社



刘
坚
文
存

上海
教育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坚文存 / 刘坚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444-1862-1

I. 刘... II. 刘...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H1-53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5016 号

刘坚文存

刘 坚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5 插页 2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本

ISBN 978-7-5444-1862-1/H·0083 定价:40.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电话:0512-53522239)

刘坚(代序)*

我原籍江苏省宝应县,汉族,1934年7月4日生于上海。

“八一三”事变后,日敌入侵上海,父亲本在海关工作,因不愿在日伪统治下做事,只身逃往重庆,仍在海关供职。我和妹妹年幼,不能随行,由母亲抚养,依赖亲友接济,艰难度日,直到抗战胜利。

1939年入小学。沦陷区的上海,百物腾贵,民不聊生,我的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更没有保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母亲节衣缩食让我继续上学。这使我懂得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从小就培养了勤奋好学的习惯。当时的生活非常清苦,家里经常的下饭菜不过是一小碟酱豆腐而已。可是每天在昏黄的灯光下,只要一拿起书本,我就忘记了一切。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书本是一个可以忘忧的世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入中学。在中学深受国文教师海盐江辛眉先生和海宁孙玄常先生的影响,培养了对语文的兴趣。1950年初,父亲病故,因家庭经济困难,全家离开上海,投奔在南昌的叔父家。我也从当时就读的上海育才中学转学到了南昌豫章中学。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5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在《中国语文》编辑部、宋元词汇研究组、现代汉语研究组、近代汉语研究室做研究、编辑工作。担任过组(室)秘书、副主任、主任等职。1956年至1958年曾任当时的所长罗常培先生的秘书。1979年提升为副研究员,1985年提升为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文学组成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

我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而以后者为主。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对我国语言研究一度产生较大影响,这一学派(以及接近这一学派的观点的学者)的论著不断介绍到中国来。我认真阅读了布龙菲尔德、海里斯、布洛克、特雷格等人的语言学论著,并且试图采用这一学派的方法来分析汉语句子结构。《论助动词》(1960)是这方面的成果。陆志韦先生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序

* 本文是刘坚先生写的一个自传,大约写于20世纪90年代。

论初印于1938年,全书初印于1951年)也是在方法上影响我的研究比较大的一部书。《论助动词》在这些论著的影响下,从句法标志而不是从意义出发来划分助动词这一个词类,明确指出了助动词不同于副词和动词的一些语法特点。

与此同时,我和语言研究所的几位同事合作翻译了美国弗里斯(C. C. Fries)的《英语结构》一书。弗里斯并不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但是他的著作也没有结构派忽视意义的偏颇,在他的著作里已经可以见到后来“语用学”的一些端倪。我在以后的语法研究里注重词语的用法,多少也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7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一书的编写工作。这部书主要供非汉族人学习汉语使用,因此与编给汉族人使用的词书不同,特别注重非汉族人学习汉语时的难点。选词以虚词为主,也收了一部分实词,每个词按意义和用法详加说明,实际上是一部现代汉语的用法词典。在编写的准备阶段,我深入到外国留学生中做调查研究,搜集材料,发现问题。调查研究的成果已大部吸收到《现代汉语八百词》书中。这部书的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国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很快就有了日文译本。

80年代我的研究领域转向近代汉语,即现代汉语的前身,唐宋以来的早期白话。这是因为我在研究现代汉语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要认清现代汉语中的某些现象,就必须追溯到它的源头;现代汉语是“流”,近代汉语是“源”,不做“穷原竟委”的研究,就不能真正认识现代汉语。在这方面,吕叔湘先生40年代所做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已经为我树立了榜样。

早在1958年,我已经协助吴晓铃先生等编纂了一部《关汉卿戏曲集》,一部《关汉卿杰作集》,接触到近代汉语。1962年又写了论文《关于〈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校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深知要想在近代汉语领域内做一点工作,首先必须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做一番搜集、整理、校勘、诠释的工作,否则就寸步难行。

“文革”前,我花了大约三年来做近代汉语的资料工作。由于历史上占据书面语统治地位的是文言,在白话文运动兴起以前的数千年内,很少有人用真正的白话写文章,因此要搜集早期白话资料,只能到汉译佛经、禅宗语录、宋儒语录、笔记小说、稗乘野史、白话讲章、审案记录以及通俗文学作品中去爬梳。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大学时期,我师从游国恩、浦江清、林庚等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前辈学者传授的知识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知道该从哪些典籍里去找到所需要的资料。50年代整理关汉卿戏曲,也使我得到进行古籍校勘的实践经验。这都是做近代汉语资料工作所不可缺少的。

经过三年不懈的努力,我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料,不幸的是,这些资料经过“文革”动乱,大部散失了。从干校回到北京,恢复研究工作之后,能找到的只是一些零星材料了。但是我没有灰心丧气,在吕叔湘先生的鼓励下,我从头做起,又经过几年的努力,1981年发表了论文《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运用》,1982年发表了论文《古代白话文献简述》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年代蠡测》。

《古代白话文献简述》从敦煌文献、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诗词曲、文集、史籍、笔记小

说、白话小说、会话书等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古代白话文献,论述了各类文献作为语言研究资料的价值。有的文献长期湮没,不为我国学者所知。例如成书于五代南唐的禅宗语录《祖堂集》,既是重要的禅宗史料,又是宝贵的古代白话文献,可是中土早已佚失,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失载。我根据国外资料,对这部书作了扼要的介绍。这篇论文对于开展近代汉语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我试图运用某些语法标准来给那些年代不明的古代白话作品断代,进而利用这些作品来做语法史的研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年代蠡测》和《略谈“话本”的语言年代问题》(1985年)等论文都属于这种性质。至于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方面的专题研究则有:《语词杂说》(1978年),《“治鱼”补说》(1987年),《试论“和”字的发展,附论“共”字和“连”字》(1989年)等。

近代汉语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队伍还不够壮大,大学里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也比较少。为了提供一本合适的教材,向学生介绍用近代汉语写的各类作品,让学生知道,除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外,还有近代汉语需要注意,值得研究,我编写了一部《近代汉语读本》(1985年)。这部读本主要选注晚唐五代至明代的作品,也选了9世纪以前的几段接近口语的文章,以资对照。每一种作品前面都有解题式的简要说明,后面都有注释。这部读本体现了我在近代汉语方面的研究成果。

接下来我以比较多的精力与北京大学蒋绍愚先生共同主编了一部《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这部汇编收录唐五代至明代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口语实际情况的文献资料,分卷出版,目的是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者提供一份可资参考的基本材料,目前已经出版了“唐五代卷”(1990年)。预计出齐后字数达一百二十万。

古代白话资料非常分散,有些书不容易看到,能看到的也往往要翻检一大部书才能找到不多的白话资料。即使找到这些资料之后,也还要做校勘、标点、考订年代等工作。如果每个研究者都要重复这一套工作,那实在是很大的浪费。《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研究者修桥铺路而编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梅祖麟教授始终热心支持这项工作,并且慨允担任编纂本书的顾问。

参加编校工作的同志,在主编的领导下,严肃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保证了工作质量。书中有些资料是国内未曾见过的。以“唐五代卷”为例,其中《游仙窟》的底本“醍醐寺本”和校本“真福寺本”、“庆安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底本“东寺观智院藏本”,都是国内罕为人知的,我设法从日本找来了影印件,通过这部汇编的出版,第一次介绍给国内的研究者。

我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并且患有多种疾病,但是我仍然挤出较多的时间尽力培养研究生。我深知“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道理,研究事业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做成的,必须有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奋斗才能够有所成就。因此我乐于帮助年轻同志,只要这些同志愿意学习,我可以放下手头正在做的工作,跟年轻人讨论切磋,并以此为乐。对于正在起步做研究工作的同志,我从来不问他们又写了多少文章,而总是问他们又读了哪些书。“厚积薄发”是我对年轻人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要求。但这并不是不鼓励年轻人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我每年要花相当多时间为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同志审阅稿件,

认真查对引文,认真提出意见。

近十年来,我曾出访美国、法国、日本等国,进行讲学和交流,得到这些国家学术界人士的好评。在国内接待了许多外国学者,加强了彼此的联系。我在这方面的活动,为把汉语语言学推向世界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目 录

刘坚(代序)	1
--------------	---

上 编

论助动词	3
关于《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校释	11
语词杂说	18
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运用	22
古代白话文献简述	29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	38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的白话资料	50
《近代汉语读本》补正	57
“治鱼”补说	60
试论“和”字的发展,附论“共”字和“连”字	66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	75
《训世评话》中所见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特点	86
略谈“话本”的语言年代问题	95
《世说新语》词语补释	100
建国以来近代汉语研究综述	107
论汉语的语法化问题	120
联系文化和历史进行词语研究	126
时态助词的研究与“VO 过”	136
什么是“露柱”	141

中 编

部分和全体	147
-------------	-----

上海话跟普通话不同的若干语法格式	149
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时的语法错误举例	154
对中学语法教学的一点意见	158
论简化字的推行	160
读《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	163
语言学研究要面向应用,面向群众	167
评改一篇短文	169
要让老百姓看懂	172
自由而结合面窄的语素	175
歧义引起感情色彩的歧异	176
语文平议	177
伊甸园——看电视偶记	182
许国璋不是冯国璋,孙敬修不是孙警修	183
一字之差	185
顾此失彼二例	186
“女孩子看不见斗鸡眼了”	187
新闻用语和法律语言——从“配偶”一词说起	189
漫谈学习语法	191
文言与白话	195
“个”字用如指代词	200
定语转化成状语	202
《汉语史通考》中译本序	203
杨贺松《中国家常》序	204
《中古汉语读本》序	206
《近代汉语助词》序	209
《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序	211
《人与文》自序	212

下 编

当代杰出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	217
悼念朱德熙先生	226
语言学界的前辈赵元任先生	228
为吕叔湘先生寿	230
纪念语言学家郭在贻逝世七周年	235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想到浦江清先生	239

岁暮忆周燕孙先生	241
从北河沿到未名湖	248
哭吕先生	254
怀念吴晓铃老师	257
罗常培先生与周恩来总理	266
回忆陆志韦先生	267
记我的老师高名凯先生	272
我所认识的俞叔迟先生	274
忆江辛眉先生	277
忆我的启蒙老师徐月渔先生	283
跟黎劭西先生的一面之缘	286
向罗先生和吴先生学翻拆旧信封	288
与何思源先生的一次会面	289
大金星	291
《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读后琐记	294
《译馀偶拾》读后杂记	296
敬祝《文教资料》越办越好	299
编后记	300

上 编

论 助 动 词*

不少语法书都讨论过助动词(有的书上称为能愿动词),但是讨论的范围有广有窄,不很一致。有的语法书上所说的助动词指用在动词前面的“能、敢、会、该”等词,有的还包括用在动词后面的“了、着”和“起来、下去”之类。经过近几年来研究,大家对于助动词的性质和范围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本文打算先扼要介绍各种语法书对于助动词的看法,然后讨论助动词到底是怎样的语法范畴,它具备怎样的语法特点。意见是很不成熟的,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一 各种语法书对于助动词的看法

1.1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指出,助动词可以单独作谓语用。在这一点上,助动词不同于副词,因为双音副词虽然也可以单用,单音副词就站不住。《语法讲话》把助动词看成一种动词,同时也指出助动词和动词有一些区别,归纳起来大致有这几方面:

- 1) 动词一般可以重叠,助动词不能重叠。
- 2) 动词可以带“了”和“着”字尾,助动词不能。
- 3) 有些动词加动词的结构里可以加“过”字(例如“学过唱歌”),助动词加动词的结构里不能。
- 4) 动词加动词,第一个动词有时候可以抽掉,有时候不可以抽掉;助动词加动词,助动词都可以抽掉。
- 5) 动词带体词宾语是常例,助动词不能带体词宾语。

《语法讲话》根据这些标准划分出来的助动词是:

能	能够	会	可以	可能	得(dé)
敢	肯	愿	愿意	要	
应	应该	应当	该	须 须要	得(děi)①

* 这篇文章是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小组集体工作的一部分,先写出来发表,以征求意见。

1.2 跟《语法讲话》看法比较一致的是《汉语》课本。课本把助动词称为能愿动词,是动词的一个附类,所用标准和所定范围接近《语法讲话》。

1.3 比较早的语法书一般不注重助动词和副词的区别。比如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就把“能、得、会、可、必、足”归入“限制词”里的“判断限制”类。吕先生的“限制词”就是副词。^②在他近年所著的《语法学习》里也不列助动词这一类,“能、会”等等属于动词。^③

1.4 王力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里有一类“助动词”,是“把”和“被”。^④这两个词一般语法书上称为介词或副动词。这类词跟我们现在讨论的助动词是“名同实异”的,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吕先生看作副词的“可、能”,王力先生在讲词类的时候也把它们列入副词。^⑤在讲“能愿式”的时候,王先生把“能、可、必、该、要、欲、肯、敢”看作“能愿末品”。^⑥他的“末品”也是副词性的词语。

1.5 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把助动词算做动词的一类,助动词“帮助动词,占其一部”。^⑦这意思是说,凡是“帮助动词”表达某种意义,并且和动词共同构成谓语(“占其一部”?)的,都是助动词。《国语文法》的助动词范围最广,包括用在动词前面的“可以、要、应该、一定、许、被、来”等等,也包括用在动词后面的“得、了、着、来”等等。^⑧

1.6 黎先生和刘世儒先生合著的《汉语语法教材》里,助动词的范围大致同《国语文法》相当,包括用在动词前面(“前附”)和后面(“后附”)的两种。他们认为助动词和副词是两个不同的词类,它们之间有以下三点区别:

1. 助动词是没变质的动词,能独立。2. 有时可以把它后边被它所助的动词作为它的宾语。3. 要是两个动词连用,在语意上如果头一个确是帮助后一个的,就随时可以把头一个派作助动。这三点,大都不是“副词”所能一样办到的。

但是又说:

它和副词只是词法上性质的不同,句法上的“作用”实在是“差不多”的。^⑨因此《教材》把句子中的助动词看作一种“副词性的附加语”。^⑩

1.7 从上面的简单叙述里可以看出,助动词跟副词、动词到底是不是同类的,各家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的语法书不区别助动词和副词,有的书加以区别。有的语法书把助动词算做动词的附类,有的书却不这样看。助动词跟副词有没有区别,助动词跟动词有没有区别,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助动词是怎样的语法成分。因此,我们的讨论就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暂时撇开黎著列为“后附”的“助动词”,只讨论“前附”的那些词。因为在我们看来,用在动词前面的词和用在后面的词的语法特点是不完全一样的。

二 助动词和副词有没有区别

2.1 助动词和副词的界限在语法书里一向划得不很清楚。“才去,能去,还去,会去,

就去,敢去,都去,该去”这些格式里,“去”前面的成分到底是不是同类的,不容易确定。上文 1.6 所引《汉语语法教材》用来区别助动词和副词的三项标准中,第一项标准用能不能独立来区别,比较明确,但是第二、三两项在运用的时候会碰到困难。究竟在什么时候可以把助动词后面的动词看作“宾语”,著者并没有告诉我们。根据什么来确定头一个动词“在语意上”“确是帮助后一个的”也不容易掌握。如果没有语法形式作根据,光凭意义很难解决语法问题。严格说来,这并不是语法分析的可靠的手续。我们应该把意义和形式结合起来考虑。

这里提出的第一项标准跟《语法讲话》所提出的“助动词可以单独作谓语用”是一致的。根据能不能单独作谓语的原则,可以把助动词跟单音副词分开,因为单音副词都不能单独作谓语(除了否定副词“不”以外)。但是这个原则不能用来区别助动词和双音副词,因为有的双音副词也可以单独作谓语。^⑩

助动词和副词的界限既然有一部分没划清,有些词应该属哪一类,各人的看法就不完全一样。像“一定”,《语法讲话》把它列入副词,^⑪而《国语文法》却把它列入“表必然”的助动词。^⑫

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研究,除了能单独作谓语这一点以外,助动词和副词还有没有其他的差别。如果有足够的语法形式标志说明助动词和副词是两种不同类的词,那就应该把它们分开;否则助动词和副词不能分类。

2.2 我们看下面的两组例子:

甲组	乙组
才去	能去
还去	会去
又去	肯去
也去	该去
刚去	敢去
再去	配去
或许去	能够去
必须去	可以去
必定去	应该去
一定去	愿意去

比较这两组例子以后,我们会发现,乙组里的“能、会、肯、该、敢、配、能够、可以、应该、愿意”都可以说成“不×不”的格式,例如“不能不去,不会不去”等等。甲组里的“才、还”等大部分不能这样说,能说成“不×不”的只有“不再不去”和“不一定不去”。

关于“再”和“一定”,下面还要讨论,这里先谈“才、还、又、也、刚、或许、必须、必定”几个词。这几个词一般语法书都看作副词,而且是“严格的”副词,因为不是形容词兼作副词。这些副词跟乙组的“能、会”等等的区别在于不能说成“不×不”,这是很清楚的。并且,形容词作为副词来用的时候也不能说成“不×不”。像“快走、白吃、老哭、光说”都是这

类例子。

“再”和“一定”在“不×不”这个格式上跟“能、会”之类是一样的：

不再不去，不再不吃……

不能不去，不能不吃……

不一定不去，不一定不吃……

不会不去，不会不吃……

但是“能、会”可以用“很”来修饰，“再、一定”不能：

——

很能吃

——

很会吃

从这项排比可以看出，“再、一定”跟“能、会”的语法特点是不完全一样的，它们两类不同的词。

因此，我们可以把助动词和副词区别开来：助动词可以说成“不×不”的格式，可以用“很”来修饰；副词一般不能说成“不×不”的格式，不能用“很”来修饰。甲组的“才、还、又、也、刚、再、或许、必须、必定、一定”是副词，乙组的“能、会、肯、该、敢、配、能够、可以、应该、愿意”是助动词。

三 助动词和动词有没有区别

3.1 上文说明助动词和副词是不同类的，现在我们要研究助动词和动词是同类还是不同类的。

有的语法书从形态方面着眼，拿能不能带词尾“了、着”和能不能重叠来分辨助动词和动词：助动词不能带词尾“了、着”，不能重叠；动词能带词尾“了、着”，能重叠。

用形态标志来区分助动词和动词有一定的限制。上文 2.2 所举的跟副词有区别的“能、会”类助动词诚然缺乏“了、着”类形态标志，但是动词也并不是都能带“了、着”的。像“嫌、在（“我在家”）、以为、害怕、讨厌”等等都不能带词尾“了”，“到、丢、懂、去、忘记、同情、反对”等等都不能带词尾“着”。可见助动词虽然不带词尾，但是不带词尾的并不都是助动词。

用能不能重叠来鉴别助动词和动词也有类似的困难，并不是所有的动词都能重叠。“掉（“掉头发”）、服（“我算服了你了”）、懂、死”都是不能重叠的动词。而且，我们很容易发现，一般语法书上所说的副动词（介词）也是不能重叠的，因此，“不能重叠”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助动词的特性。

3.2 从形态标志上既然难以分辨助动词和动词，我们不妨从助动词跟动词的结合上来判断，看看“助动词+动词”的结构跟一般“动词+动词”的结构在性质上一样不一样。如果证明这是两种不同的结构，那就说明助动词和动词不是同类的；否则助动词和动词就不能分类。

“动词+动词”可以是向心结构，可以是后补结构，也可以是动宾结构。当然还可以是并列结构或连动结构，不过这里不必考虑。“助动词+动词”是不是向心性的，或者是后补

性的、动宾性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3.3 有的语法书把助动词看成动词的附加语，实际上是把“助动词+动词”看成向心结构。其实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比较：

甲组	乙组
对/喝	会/喝
陪/坐	要/坐
合/请	该/请
分/种	肯/种
代/送	能/送
替/写	配/写

这里的甲组都是动词和动词组成的向心结构；乙组里的“会、要、该、肯、能、配”，在2.2里已经肯定是助动词，“会喝”之类都是“助动词+动词”结构。这两组结构性质并不相同。对于甲组的例子，假若要提问题，我们可以问“怎么～？”（“怎么喝？对喝”，“怎么坐？陪坐”。），也可以问“～吗？”（“对喝吗？对喝”，“陪坐吗？陪坐”。）。对于乙组，不能问“怎么～？”，只能问“～吗？”（“会喝吗？会喝”，“要坐吗？要坐”。）；回答的时候，可以说“会喝”，也可以单说“会”；但甲组的“对、陪、合、分、代、替”就不能单独回答问题。由此可见，“助动词+动词”结构跟向心式的“动词+动词”结构是不同的。

3.4 有的语法书把“助动词+动词”结构看成后补结构。比如陆宗达等著《现代汉语语法》（上册）就认为“我要走了”里的“要”“是主要动词，一点儿也不是助别人的，比方上头那句话（按指“我要走了”）后头加了个了表示实现，到了儿是给谁加的呢？是要了呢，还是走了呢？谁都看得出来，是要了”。因此，“在咱的语法系统里，造句法讲补足关系的时候说一句‘动词可以用动词作补足语’就把什么助动词不助动词的都给包括进去了”。^⑭很明显，著者认为“我要走了”里的动词“走”是“要”的补足语。应该说，著者得出这个结论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如果说“要走了”里的“了”是给“要”加的，那么能不能说“该走了、能走了、肯走了”里的“了”也是给“该、能、肯”加的呢？恐怕谁都不会这么理解的。其实“了”不是加在“要”上面而是加在“要走”上面的。“要走”也不是后补结构。比较：

泡透	要走
泡得透	——
泡不透	——

“泡透”是后补结构，中间可以加“得”或“不”；“要走”不是后补结构，中间不能加“得”或“不”。

3.5 “助动词+动词”也不是动宾结构。

“动词+动词”，有时候可以造成动宾结构，例如：

- 1) 喔，我忘记问了，姐夫好吧？（丁西林）
 姊姊！我要去开会，顾不上招呼你！（赵树理）
 武震在桥上指挥修桥。（杨朔）